

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发展论坛

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郑新立

统筹三个关系 推进自主创新

张于喆

编者按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了2015年经济工作的五项任务,其中一项就是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其余四项任务包括积极发现培育新增长点、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都

是围绕稳增长这一任务来部署的。会议强调要通过转方式调结构、狠抓改革攻坚、突出创新驱动来实现稳增长。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是实现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

的经济增长点。

稳增长需要重新聚焦农村改革发展

农村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30多年来,每一次大的改革发展的突破,都来自农村。我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农村人口不断减少、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过程,是农业由一个弱质产业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前进的过程。目前,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条件已经成熟。一是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有出路;二是市场对有机、绿色食品的需求旺盛;三是农业机械、设备供给能力充足;四是财政、金融支持农业的能力强大。我们应紧紧抓住机遇,加快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有关农村改革的各项部署,释放农村劳动力、土地和消费的巨大潜力,改变农业现代化滞后于工业化、城镇化的局面,为稳增长作出重大贡献。

落实农村土地承包权可以抵押、担保、转让的政策,实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在自愿、有偿和不改变用途的条件下,允许承包地向合作社、农业公司、家庭农场集中,发展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农业。做好了这件事,有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有利于把大部分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有利于拉动农用工业发展,有利于把一部分素质较高的劳动力留在农村。据调查,在一些农村,由于实行土地集中耕种,富余农民进城打工或就地发展多种经营,人均收入增长数倍,一下子就跨入中等收入家庭。农民凭借对土地的承包权获得法人财产权收入,对土地的流转就会起到鼓励作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慎重稳妥推进农户宅基地制度改革,允许宅基地抵押、担保、转让,第一次赋予宅基地以商品属性。进城农民把农村的宅基地和房产有偿转让出去,就会为农民工在城市购房或租赁住房提供资金支持,加快农民市民化。宅基地有偿退出后一部分转变为耕地,一部分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可带来土地利用的节约。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还提出,建立城乡一体化建设用地市场,允许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权同价,使农户从土地被征用中更多受益。这些改革,可使农民分享到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增值的收益,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重新聚焦农村改革,释放农村发展的巨大潜力,就能使农民到2020年与城市人口一样同步实现小康。农民收入的增加和农民工的市民化,将增加他们的购买力,对工业品的需求扩大,将带动城乡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稳增长需要构建新的区域增长带和增长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完善区域政策,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坚持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同时提出要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提出要通过改革打破地区封锁和利益藩篱,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些重大举措,将形成新的区域增长带和增长极,对稳增长发挥重要带动作用。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新时期党中央提出的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是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大行动。“一带一路”涉及65个国家,总人口44亿,年产值21万亿元,分别占全球的62.5%和28.6%。显然,发展中国家居多。历史上这些国家就同我国有着密切的经济往来。通过建设一批铁路、公路、港口,实现陆路、水路和空中互联互通,就能进一步密切中国同这些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实现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沿线国家有着丰富的能源、矿产、农业资源,实现互联互通之后,他们的资源优势就能转变为经济优势,搭上中国这列快速前进的列车,同时对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给予有力支持,以造福于各国人民。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有利于周边地区的和谐稳定,将为各国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

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是三地人民的强烈愿望。现在环京津地区尚有大量贫困人口,需要京津两市对河北的发展给予帮助、支持和带动。同时,京津两市人口过于集中,交通拥堵、房价过高、污染严重,需要向周边地区疏散非核心功能。长期以来,行政区划阻碍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造成了人为的发展差距。按照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尽快使京津市区地铁同周边河北省的市县连接起来,形成半小时生活圈和一小时商务区,减少中心城区的功能和人口,并为周边中小城镇创造较多的就业机会和优美宜居的环境,将能实现京津冀的同步发展,构建整体优势,力求成为全球具有重大带动力的都市群。

长江经济带人口密集、交通发达、土地肥沃、雨量充沛,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总量的40%以上。以长江黄金水道为纽带,全流域经济具有紧密的关联性。加强长江经济带的统筹规划,发挥上海自贸区的龙头带动作用,激发全流域的经济增长潜力,对带动全国经济发展,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沿江各地区的发展很不平衡,应主要通过发挥市场的作用,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全流域的发展,带动东中西部的协调发展。

年下降,居民消费价格上升幅度去年11月已下降到1.4%,说明通货膨胀已成为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主要风险。目前我国经济的货币化率略高一些,但经济的证券化率明显偏低,这是由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格局所决定的。因此,现阶段M2的总量大一些,是正常的、必要的。在当前面临通货紧缩危险的情况下,适当增发一些货币,适度扩大总需求,不会引发通货膨胀,对稳增长将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稳增长需要有一批新增长点作为支撑

近几年,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2013年,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6.8%,已成为重要增长点。第三产业对就业的贡献更大。2013年,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提高了2.4个百分点,达到38.5%,是改革以来提高幅度最大的一年。同期,第一、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分别下降2.2和0.2个百分点。这是经济结构的积极变化。应当看到,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的提高还有很大空间。因为全世界平均水平为60%,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为50%。我国要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还需提高12.5个百分点,可以增加近一亿个就业岗位。若提高到全世界平均水平,可增加1.7亿个就业岗位。第三产业中发展最快的是生产性服务业,需要具有专业技能的人才。为此,需要加大对专业技能人才的培养。同时,要继续推广“营改增”税制改革,进一步降低新办企业门槛,发展小额信贷,鼓励全民创业,为第三产业发展创造更好的政策环境。

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互联网产业、新能源、新材料、电动汽车、生物产业、先进制造业、海洋产业等。鼓励技术创新和技术成果的产业化,以自主创新带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目前,各个地区在自主创新上发展很不平衡。2012年,深圳市申请国际专利数量占全国的48.1%。如果能把深圳鼓励创新的经验在全国各个城市推广,必将极大地激发全国人民的创新潜能,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转化为数量巨大的新增长点。

我国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仍然落后。铁路通车里程不到美国的二分之一,多数2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仍没有地铁。各种管道总长度,美国有50万公里,我国仅有5万公里。道路和停车场建设远远满足不了群众的需要。污水处理、垃圾处理设施不足,烟囱脱硫脱硝除尘设备不适应治理大气污染的要求。运用特许经营权的方式,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事业建设,可形成持久不衰

稳增长必须释放需求的巨大潜力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经济增长机理发生的一个最大变化,就是由供给约束转变为需求约束。在传统计划体制下,供给不足是主要矛盾。其主要表现就是商品匮乏,根源在于投资权限的高度集中和分配上的大锅饭,严重制约了企业和劳动者积极性的发挥,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求不足则成为主要矛盾。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就是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张和广大居民有支付能力需求之间的矛盾不断发展,导致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二战以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通过加强经济预测和宏观调控,积极推行福利社会,使生产过剩的矛盾大大缓解,现在甚至走向了反面:由于公共福利的负担超过了财力的承受能力,出现了债务危机。

从1981年到2013年,我国投资率从32.5%一路攀升至47.8%,居民消费率则从52.5%一路下滑至36.2%,分别上升了15.3个百分点和下降了16.3个百分点,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达到了失衡状态,导致了目前的产能过剩。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上上了生产能力无限扩张和广大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下降的路子。解决当前经济下行、增长乏力问题,实现稳增长目标,必须对症下药,从扩大内需入手,破解需求不足的瓶颈。

扩大内需的重点应当放在提高居民消费率和扩大公共服务消费上。这就必须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尽快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特别是农民的收入。要增加公共服务的供给,包括养老、医疗、教育、环境、交通、信息等。提高居民消费率是破解需求不足难题的根本出路。如果通过实施各项宏观经济政策,将居民消费率提高到上世纪80年代初的水平,每年将会有近10万亿元的商品由现在用于投资和出口转变为用于居民消费,不仅可使居民生活水平有一个大幅度的提高,而且将对经济增长产生强劲的拉动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力度,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这是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在一般情况下,货币政策的主要功能是调节总需求,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是调整结构。把积极的财政政策与松紧适度的货币政策结合起来,是实现调结构和稳增长双重目标的基本要求。目前,我国各级政府的债务率不到40%,在世界各国中属于最低的水平,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具有很大的空间。政府适当发行一些长期建设债券,引导社会资金投向,促进结构调整。我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已连续三

新常态下改革者强创新者胜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 张占斌

释放。

应当说,新常态包含着经济增长速度转换、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动力变化、资源配置方式转换、经济福祉包容共享等全方位转型升级在内的丰富内涵和特征。新常态下,增长速度由高速向中高速增长转换,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换,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资源配置由市场起基础性作用向起决定性作用转换,经济福祉由非均衡型向包容共享型转换。这一系列深刻的变化,使得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改革与创新任务更加迫切。概括来讲,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一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实现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新常态。新一届政府将转变职能和简政放权作为深化改革的“马前卒”、“当头炮”,已取得了重要进展和显著成效。截止到2014年10月底,新一届政府已累计下放和取消行政审批等事项600余项。新常态下,要继续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重点解决监管“短板”和服务滞后问题,着力解决好“最后一公里”问题,尤其要加大对地方改革的指导和检查。与此同时,要积极探索第三方评估长效机制,把那些含金量高的、管用的审批事项彻底交给市场和企业,真正为市场和企业松绑,真正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二是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新常态。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4年1至3季度,GDP增速为7.4%,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达到46.7%,继续超过第二产业,这显示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升级的良好态势。值得着力指出的是,我们要高度重视需求结构的积极变化。2014年以来投资增速继续高位放缓,出口增速换挡,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继续增强,1至3季度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48.5%,比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高7个百分点左右。要继续推进需求结构改革,发挥好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尤其要积极寻求新的消费热点和增长点。

三是深化财政金融改革,支撑产业迈向中高端新常态。新常态经济是产业结构处于中高端的经济,这就要求有健全的财税金融体制做支撑,要求聚焦“激励力、补短板、强实体”,使中高速增长与中高端产业相适应。2014年1至3季度,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分别为12.3%和11.3%,明显高于工业平均增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态势良好。从财税体制改革层面看,要加快“营改增”改革,适时在生活服务业、建筑业等行业进行“营改增”试点,要进一步加大对生产性服务业的财税支持力

度。从金融体制改革层面看,要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逐步拓宽金融机构负债产品市场化定价范围,使金融产品真正服务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四是发挥创新驱动的原动力作用,实现创新驱动经济新常态。改革与创新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新常态经济是创新驱动型的经济,必须将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应用转化能力放在促进形成新常态经济的核心位置。要更多支持创新型、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尽快形成新常态下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产业驱动力。尤其要深化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国家创新体系,坚持走创新驱动和内生增长之路,努力形成“人人创新”、“万众创新”的新局面。

五是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实现扩大开放新常态。当前,新常态下扩大开放的重点任务是加快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落实好“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政策工具,加快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建设。要充分利用APEC会议、东亚峰会、博鳌论坛等机制平台,积极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推动同周边国家互联互通,努力打造高水平全方位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是新时期我国的重大国家战略。经过多年努力,我们虽已逐步走上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并取得长足进展,但依然存在着科技与经济结合不紧密、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科技管理体制不完善、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等一系列问题。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还将发生重大变化。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要求我们必须立足当前、面向未来,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继续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

一、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关键

纵观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的发展历程,美国、英国等国家高度重视原始创新和基础研究,走的是技术领先者的创新道路,日本、韩国等国家则充分利用外资和技术,重视技术转移获取技术领先者的先进知识,走的是技术跨越者的创新道路。各个国家的创新道路各不相同,各具特色。应该说,对于创新道路而言,重要的并不是哪条道路更好、更优越,关键是要看其是否能适应本国经济发展阶段、社会状况和国际政治、经济大环境的发展要求。因此,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关键,就是要基于我国大国经济体、后发国家、转轨国家的基本国情,准确把握时代特征,一方面充分吸收、融合发达国家的经验,另一方面总结自身发展历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坚持发挥自身特色,提高科技投入效率,努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就是要求我们充分尊重历史与现实,在追求效率与效果相统一、统筹兼顾各方利益的基础上,有效融合事前设计与事后修正,走出一条既能发挥市场作用又能根据国家战略有效动员和组织创新资源,既能激发创新行为主体自身活力又能实现系统各部分有效整合的道路。因此,我们必须统筹好以下三方面关系:

第一,统筹好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的关系。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理清目标上的优先次序,突出阶段性重点,也要考虑各环节的衔接配套。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站在国家层面总揽全局,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目标,分清问题的轻重缓急,利用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着力解决影响全局的重点问题、突出矛盾和关键环节。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没有先例可循。道路的目标定位和发展要求不仅来源于自上而下的传达,也来源于自下而上的渗透,这个过程是顶层设计不可或缺的动力源泉。因此,顶层设计必须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必须与基层的实践探索紧密结合。

第二,统筹好技术驱动型创新和需求引导型创新的关系。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将不可避免地对世界格局产生深远影响。我们也需要逐步改变过去科技创新方面的跟随战略,逐步改变对发达国家科技创新的依附性。因此,在面对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树立世界眼光,逐步发挥符合自身地位的积极作用,在能源、材料科学等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和国家战略需求的前沿性领域,推动技术驱动型创新,力争在部分能引发世界科技革命的领域形成局部优势。

第三,统筹好“以我为主”和国际合作的关系。实践证明,在关系国民经济脉脉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真正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只能靠我们自己。只有大力推进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掌握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才能真正将国家发展与安全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二、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对策建议

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既要遵循发达国家提升创新能力的共性特征和一般规律;也要植根于我国发展实际,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气息。

第一,培育创新友好型文化。我们必须创造一种真正有利于激发社会成员创新欲望的创新文化。一是营造宽容失败、鼓励冒险、宽容创新者的创新氛围。培养人们在面对“建设性失败”或“聪明的失败”时的一种包容态度,并引导所谓的失败者共享失败教训,把失败经历不断进行建设性总结和利用。二是破除人才的“官本位”思想,改变不利于创新的传统文化束缚。在观念短期内难以改变的背景下,必须要在待遇、话语权等方面,给予专业人才和技术人员高度尊重和宽容,为其提供干事创业的舞台,有利于个人才华的施展。

第二,促进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促进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发展经验,有针对性地解决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中的资金、管理问题,以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一是逐步完善“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的运作模式,并进一步加大对投入力度。二是建议创建“中国创新创业计划”。面向国内外拥有专利技术、科技成果的创业人员以及进入创业实施阶段的科技项目,为创业人员提供创业指导、咨询服务和资金支持,旨在促进全国范围内的科技型创业。

第三,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商业化应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知识产权将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是继续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力求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高效化、便利化和最优化。知识产权的正外部性特征,决定了必须保证创新者对自主创新成果和收益的独占,以充分发挥创新者的创新潜能。二是推动市场主体对知识产权制度的有效运用。构建能够正确评价科技成果知识产权权利状态及科技成果许可、转让等商业化问题的知识产权商业化平台,推动研发成果的产业化。

第四,加强制造业领域的创新。在美、英、巴西、印度等主要国家纷纷提出实施再工业化战略的背景下,加强我国制造业创新活动具有现实紧迫性。应继续加大对制造业的研发投入。应突出技术引进后的消化吸收再创新。同时,还应重视对核心大企业的适度引导和宏观战略指导。

(作者单位:国家发改委产业所)

本版编辑 裴珍珍

学术经纬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分析了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对2015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作了战略部署,尤其是对如何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如何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作了深入阐述。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与国外应对“新常态”的方案相比,我们更注重从战略全局高度科学认识“新常态”,更强调运用改革与创新的方法来适应“新常态”。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支撑条件和外部需求环境都已发生深刻变化,要求经济增长速度进行“换挡”,要求经济增长目标向合理区间进行“外收”。随着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外部需求出现萎缩,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世界经济,呈现出“总量需求增长缓慢、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鲜明特征,使得我国以高速增长的外部需求出现萎缩。同时,我国面临传统人口红利逐渐减少,资源环境约束正在加强,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挠等“顽疾”难以根除的风险和挑战,改革红利有待进一步强有力